

德宏芒市傣族剪纸的社会记忆研究

杨文华 杨淇^{*1}

【摘要】:作为社会仪式中沟通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的媒介,剪纸不仅是傣族宇宙观、价值观的外化物,亦是傣族传统文化表征的载体。对民众而言,剪纸技艺由学习进入个体记忆而达于文化传递;对社会来说,各类仪式中的重复操演使得剪纸技艺演化为社会记忆,促成了民族文化传播。研究芒市傣族剪纸的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问题,既要从微观视角了解剪纸文化活态传承的内在机制,更要深究傣族剪纸技艺在当下得以传承的根源。

【关键词】:剪纸;记忆;操演;仪式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8)04—0106—07

在民族传承体系中有类重要的传承,即民族技艺文化传承。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它们或是服务于生产,或是服务于生活,不可或缺。对傣族而言,剪纸就是这样一种文化存在。在德宏芒市,剪纸已然融入民众日常生活,并发挥着表达人们的审美、促进文化认同的重要社会功能;又由于傣族剪纸的缘起与主要的文化场域是祭祀、赕佛,在整个傣族文化传承体系中体现并承载着社会记忆。也就是说在人们世代剪纸工艺的传承中实现并强化了社会记忆,并通过工艺的文化路径建构着剪纸的社会记忆,包括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

德宏芒市位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东部,主要生活着傣、景颇、德昂、阿昌、傈僳等5种世居少数民族,因地域、语言、风俗、信仰等差异,这些民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元文化,从而成为德宏州的标志性符号与象征。多元民族文化不仅极大丰富了云南文化资源,还为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本与支撑,成为民族社会持续发展不竭动力的源泉。作为一种工艺与日常行为,傣族剪纸蕴含着丰富的记忆元素。与现代工业的机械化生产不同,傣族剪纸是一种手工作业,在漫长的岁月中,剪纸一直存在于傣族剪纸艺人的身体记忆与心理认知之中。作为一种媒介性的宗教用品,剪纸在赕佛中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使剪纸在实现实用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的同时,也不断地将个体记忆融汇成集体记忆,并最终成为傣族社会记忆。从这个角度看,社会记忆理论为理解民族民间工艺的存续提供了新视角。本文将从微观视角解读傣族剪纸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内在机制,剖析傣族剪纸技艺在当下得以延续的本质原因。

一、理论回溯: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

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既是社会记忆的两个不同构成,也是社会记忆在同一维度上的不同表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研究社会记忆就需要同时关注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追根溯源,学术界对集体记忆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卢梭提出的“集体性”观念。在卢梭的影响下,涂尔干认为集体意识是“在保持每个社会成员个性的同时,由于共同利益需求、共同价值评价等在交往中而形成的社会成员共有的思想观念”^[1]。集体记忆概念的最终提出是由哈布瓦赫完成的,他认为:“在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中,集体记忆是成员之间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2]集体记忆有着重要的功能,对民族而言,增强文化的内聚力与认同是其应有之义。

¹ **作者简介**:杨文华,女,哈尼族,云南财经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族文化、跨文化交际研究。杨淇,女,普米族,云南骏宇国际文化博览股份有限公司策展人,主要从事民族文化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个体记忆由两部分组成，即“铭刻在身体之上并留下印记”^[3]的身体记忆与“绘制成个体心理构图”的心理认知。前者需要大量的重复实践，在留下印记的同时将记忆融入机体之中；后者则是通过个体的理解与接纳进入个体的心理结构，成为心理记忆的有机构成。在成长的不同时期，人会有不同的个体记忆。共同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造就了个体记忆的共享部分，而生活经历与个体旨趣的不同则是导致个体记忆的差异部分。

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共同构成了社会记忆，二者密不可分，既相互依存与制约，又相互建构，共同发挥着相应的社会功能。

首先，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相互依存与制约。“意识形态、文化规范在一个社会中常占主导地位，并且决定性地塑造出记忆的社会框架，记忆的社会框架于个体记忆而言发挥着一种聚合性的统摄作用。个体需要置身于群体框架进行回忆，然而群体的记忆则是通过个体记忆进行传播和实现的。”^[4]个体记忆因着集体记忆的存在而产生发展，而集体记忆则需要个体记忆作为载体实现传承与传播。离开了任何一方，另一方也将不复存在。

其次，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相互建构。记忆是时空的产物，唯有在特定的时空中，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才成为可能。这也是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相互建构的基础。个体记忆受到集体记忆的极大影响，在集体记忆的场域中，个体才能实现自我定位，并完成记忆的建构。集体记忆则是由个体记忆演化而来，是个体在特定背景下的日常交往与对话中相互妥协的结果，二者的共同基础是相同的历史背景。

再次，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发挥着相似且不同的社会功能。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为社会记忆的建构提供了载体与基础，从而使当下的社会记忆与过去产生连续性关系。当社会记忆在不同的时代被重构时，记忆的形式和外表都会与这个社会一脉相承的轴心思想保持一致，这也就为社会的持续存在、文化的传承传播提供了理想的载体与路径。

记忆不仅是认同与秩序的基础与路径，亦是创新与进步的源泉。对一个民族与文化来说，共同的记忆造就了团结与认同。因此，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重叠促进了民族的内聚力，增强了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对一个社会而言，相似代表着秩序，差异代表着创新。集体记忆以既定存在的样式造就了个体记忆的基础相似性，为社会秩序提供了天然的合法性，维护了社会稳定；而个体记忆之间的差异则为创新提供了基础与动力，为社会生活注入了活力。

社会由个体与集体构成，因此社会记忆同样包含于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与微观的个体记忆与中观的集体记忆相比，社会记忆是一种宏观存在。英国著名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认为“个体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群体”，并且坚持认为群体具有个体的一切特征^[5]。同样，集体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社会具有集体的一切特征。人们既可以通过个体记忆来推论集体记忆，亦可以通过集体记忆的理解来阐释社会记忆。对社会记忆来讲，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是子集，是构成；对个体记忆与集体而言，社会记忆则是集合，是总成。子集拥有集合的部分特质，集合则具有子集的所有特征。

因历史的发展，社会记忆也在不断变化。可以说，社会记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社会记忆展现着不同的侧重点，而个体与集体则借着时空背景来理解社会记忆，重构社会记忆。在惯性的作用下，社会记忆多能保持核心思想的一脉相承。即便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社会记忆仍然借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在生活中继续存在。在当今生活中，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共同催生了古往今来的社会记忆相互交织的局面，使得现今的社会记忆日趋复杂。然任凭疾风骤雨，有着深厚底蕴的社会记忆仍然留存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潜藏于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深层次意识之中。

二、田野报告：傣族社会生活中的剪纸

剪纸是芒市傣族世代相传的手工艺，因使用工具是剪子或刻刀，故剪纸又称为“剪画或刻纸”。^[6]在傣族社会，剪纸主要用在枕头、筒帕、新娘盖头等生活用品上作装饰之用；在丧礼中，纸质棺罩冥房上亦有形状各异的剪纸装饰；“奁房”^[7]中的佛幡、佛伞、扎、董、板等也多为剪纸作品。这些剪纸均具有良好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并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

走进芒市傣族村寨，在柴房的环境装饰和堂屋中，有着形式各异、种类繁多的纸剪、布剪、金属剪等作品。其中纸剪和布剪多用在佛殿的门窗、佛伞、佛幡及演出道具、节日彩棚等上，而金属剪主要用于泼水龙亭的建盖上。一般喜庆节日时用红、黄、蓝、绿、金等彩纸剪纸，丧事则以白色居多；在供奉寨头神“吕贺芒”与领兵神的寨头小庙里则几乎都使用白色剪纸。常见的剪纸图案主要有佛像、菩提树、柴房、佛塔、莲花、孔雀、龙亭、花瓶、灯笼等，这些剪纸从题材和内容看，与中原或中国北方的剪纸不尽相同，风格也各异。

剪纸在许多傣族地区都有保留和传承，而以芒市的傣族剪纸保存较好，并在世代的传承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剪纸曾经是芒市傣族村村寨寨妇女老人的一门拿手手艺，几乎人人都能用剪刀剪出祭祀和赎佛用的“董”和“扎”。时至今日，剪纸的群众基础相对较好，有几个深爱自己民族艺术的老人成为其骨干或带头人，如樊涌、思章华、邵梅罕等都是芒市傣族地区著名的剪纸传承人。尤其是邵梅罕，其精湛的剪纸技艺和精美的剪纸作品得到了傣族社会的认可，也获得了“他者”的赞扬，现在有七八个中老年女性跟她学习剪纸技艺。总体而言，芒市的傣族剪纸作品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点和傣家风情，造型粗犷豪放、朴实无华、形象生动、风格独具。其清新的南国佛地乡土气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体现着傣族人民独特的审美和卓越的艺术创造，折射出傣族独特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

2006 年经国务院批准，芒市傣族剪纸被正式列入首批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中国剪纸选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芒市傣族剪纸作为中国剪纸的子项目也随之入选。在日常生活中，每当进洼、出洼、堆沙节、泼水节等，傣族人都要在自家堂屋的佛龛上插上一定数量的剪纸“扎”、“董”，以求佛祖保佑家事顺利、家人安康。寨中佛寺旁边都立有多根竹竿，其上方穿有长达数米各不相同图案组合的剪纸吊幢，佛寺内的吊幢、挂灯、横竖佛幡以及各种供奉的赎佛礼物的圆桌上，都插有不同颜色的剪纸“董”和“扎”。正是这种生活需要，使得剪纸工艺得以世代传承，剪纸艺人的技艺得以不断提升。

傣族剪纸艺人众多，其学艺路径既有代际传承，亦有自学成才。因艺人在传承或自学过程中又融入了自己的理解，所以剪纸技艺也在不断创新。此外，剪纸艺人各有所长，有些擅长剪纸，有些擅长刀刻，有些擅长手绘，有些擅长做傣戏道具，有些擅长做佛教用品。赶摆赎佛时，柴房就是一个小型的剪纸作品展示馆。剪纸艺人在表达虔诚之心的同时，也因作品被他人认可而获得成就感。二者的合力使得剪纸创作成为一项愉悦的工作。正是在这种融和的社会氛围中，剪纸艺人对剪纸的兴趣和钻研不断加深。在日常生活中，剪纸艺人也会相互交流经验与心得，精益求精，从而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然而，在社会快速转型的今天，拥有傣族民间剪纸文化资源的德宏却面临种种危机，有成就的傣族剪纸艺人越来越少，传承困难，这种世代相传的文化遗产正处于濒危状况。

三、傣族个体记忆中的剪纸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剪纸通过社会化为个体身体记忆、濡化为心理认知。这种身体记忆与心理认知既是傣族传统文化的内在化，又是其延续传承。个体跟随技艺精湛的剪纸艺人习得技艺，以大量的重复实践形成习惯记忆，并加以创新，从而形成剪纸的个体性传承机制。

（一）个体认知记忆中的傣族剪纸

个体认知记忆中的“记忆”是个体曾见到、听说或者曾经历过关于某物、某人、某事等从而在脑海中留下的印象和痕迹。虽然并非每个傣族人都掌握剪纸技艺，但对剪纸却都有所了解。正如芒市芒该村“小菩少”^[8]所说：“小时候每年‘进洼’^[9]前都会见咩巴亲手做好多‘扎’和‘董’放在竹篮里等着赎佛用。”个体关于剪纸的认知记忆是一个耳濡目染的过程，即使从来没有拿起剪刀做过剪纸的人也能在各种节日及各类仪式上看到剪纸。诸多的场域足以使个体了解剪纸，认识其现实的社会功能与价值。在反复的社会实践中，个体或有意或无意间就建构了自我的认知记忆。

在傣族社会，剪纸的意义已然超越了单纯的手工艺作品，还承载着许多愿望。对个体来说，完成剪纸所需要的各个环节如材料购买、动手裁剪、粘贴晾晒等都融入了信仰的虔诚之心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芒市傣族多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宗教在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对芒市傣族来说，奘房是各个村寨的活动中心。每逢重要的宗教节日，如摆奘南——泼水节、摆干朵——开门节、摆尚赶喊——金袈裟节等，剪纸作品都会大量出现于奘房之中。傣族以丰富的想像力与高超的技艺将纸品做成扎、董、板、佛幡、佛伞等。作为宗教活动的必备品，这些物品不仅仅是傣族剪纸技艺的载体，更是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众沟通人神的重要媒介。一位“咩巴”^[10]言到：“上奘前赕佛用的剪纸是家家都要准备的，自己剪也好，去丙午街买也好。但是自己剪是最好的，更能得到佛祖的保佑。”

个体关于剪纸的心理认识是在习得过程或在特定仪式中不断形成的，是一种濡化过程。赫斯科维茨认为：“濡化贯穿于一个人的始终，濡化是在特定文化中，通过学习经验获得存活于该文化的能力。”^[11]对傣族社会来说，剪纸是一种熟悉的技艺与存在，从而使傣族浸润在剪纸文化氛围中而不自知，却很自然地完成了认知—习得—传承的全过程，不断培育并加深着普通民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催生着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认知记忆强调个人心理机能，主要通过族内交往、节庆活动、宗教仪式而逐渐形成。在剪纸过程中，选材、剪刻、粘贴、晾晒、购买、使用、交流等环节无一不在加深个体对剪纸技艺、图案、样式及意蕴的心理认知，并使其成为个体关于剪纸记忆的核心内容。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研究发现：“与人的记忆、情感、思维等相关的东西存在于无意识中，即情结，人们只要触及与这些情结有关联的词汇都会产生不自觉的拖延反映，说明情结本身自成体系，并且具有内在的驱动力，如同存在于总体人格中单独存在的人格结构、微小的人格结构。”^[12]在傣族社会中，即使大部分人对剪纸的象征意义、不同场域中的作用并没有深入地思考和研究，但剪纸的制作过程及在各种场域中的位置已经内化为个体内心深处的记忆，从而内在地推动了剪纸文化的传承延续。

（二）个体习惯记忆中的傣族剪纸

作为一种手工技艺，剪纸的制作与艺人的经验、习惯等息息相关。在实践创作中，剪纸艺人所经历的由陌生到熟练的过程正是习惯记忆形成并发挥作用的过程。在重复操作的过程中，艺人在工具使用和材质挑选方面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方法，从需要手绘到直接裁剪，从一种图案到多种图案，从简单样式到复杂样式，剪纸文化与个体习惯记忆相互交融，多元的剪纸风格由此形成。

保罗·康纳顿将“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看作是身体实践的两种形式。他认为体化实践如微笑、握手等是通过肢体语言进行信息传达的过程。傣族剪纸技艺文化的传承、传播与文化持有者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如剪纸艺人的构思、创作、运用等，其中体化实践不仅强化了剪纸艺人的习惯记忆，并且对剪纸文化传承起着重要作用。以代际传承为例，剪纸技艺通常是身口相传，这里“身”放在“口”之前是有一定道理的，身教需要学徒在观摩师傅剪纸制作和讲述全过程后，边回忆边模仿。在个体认知记忆的基础上，亲身实践才能真正习得剪纸技艺的精髓，并且在重复操作中形成一些个体风格。

个体身体记忆源于重复操作，更源于傣族人对剪纸文化的热爱。本文中的体化实践更多强调的是传统傣族剪纸形成的个体习惯记忆，康纳顿认为：“习惯既是一种影响体化实践的因素，又是一种知识，是一种包括手在内的身体记忆；在培养习惯的时候，恰恰是我们的身体在‘理解’。”^[13]所以，看似不断重复的剪纸过程，实质上是对习惯记忆的唤起与加深。这同时也隐性地包含着新作品的构思与创作，从而使傣族剪纸文化传承更具活态性和创新性。

刻写实践也是身体实践的一种方式。在信息大爆炸时代，人们运用诸多现代化的手段来记录历史的与当下的信息，这也为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出路。现今的芒市傣族也在尝试用新方式书写传统文化。傣族剪纸非遗传承人樊涌老师和他的团队，历时半年以动画短片的形式来讲述傣族泼水节的故事，其作品《圣域魔火——傣族泼水节的传说》将傣族民间神话故事、剪纸工艺、古傣语文化融为一体，展现了傣族传统文化之精髓。由此可见，在刻写实践中，主动或被动的信息传播或者获

取，都能使个体身体实践在多感官认知过程中累积形成个体习惯记忆。

身体实践是一种身体的惯性或身体自动化过程，但无论是体化实践还是刻写实践都对人的身体有不同程度的依赖。其中，体化实践基于个人身体，在重复中使个体习惯记忆得以强化和延续；刻写实践以体化实践内容为蓝本，独立于人的身体，主要靠书写、摄影、剪辑等活动，通过视觉效应、听觉效应对个体感官产生影响，以文化记录、文化传播形式将记忆储存或传递，使受众在“先知”^[14]基础上对原有认知记忆有所增减，从而构建出新的习惯记忆，从宏观角度看，这也是文化变迁中普遍的新陈代谢现象。

（三）个人记忆中的傣族剪纸

接受媒体采访时，傣族剪纸文化非遗传承人邵梅罕谈到：“从13岁开始便跟着村里的老人学剪纸，平时一有时间就动手练习。”^[15]从学习剪纸至今的35年中，邵梅罕老师的技艺日益精湛，经验愈加丰富。邵老师认为每次谈及自身剪纸经历都能唤起自身深层次的个体记忆，也为自己带来了灵感。田坝的花草鱼虫、奘房的佛塔、做摆的民风民俗等都是邵老师的剪纸题材，其代表作有《犁田》、《耕》、《丰收时节》、《麒麟》、《孔雀》以及《吉祥》，还有牛、虎、猪、鸡、龙等生肖剪纸。无论是充满宗教色彩的动植物剪纸，还是充满生活气息的傣家农耕生活，这些作品其实都是邵老师对傣族日常生活的理解及自我审视的表征。作为物化形式，剪纸反映了傣族社会风俗习惯，承载了傣族文化主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傣族民间剪纸艺人内心理解的外化物。

思章华、樊涌等其他剪纸艺人也都与傣族剪纸有着不同的故事，他们的个人史、生活史交织在一起，不仅构成的个体记忆，最终汇集成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人们通常在社会中才获得他们的记忆。社会使他们的回忆、识别、对记忆加以定位成为可能。”^[16]傣族剪纸文化的个体记忆生成于傣族社会并融于其中。

四、傣族集体记忆中的剪纸

社会记忆的存在是活态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记忆有着差异性的图式与外表。社会记忆有着重要的功能，其中之一就是服务当下社会。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用过去的记忆来满足现时的社会需求，从而，历史与过去的社会记忆成为人们获利的重要资源。民族民间工艺文化是人们运用社会记忆为当下社会服务的表现。于个体而言，关于民间工艺文化的记忆，是为了满足当下对这种工艺的需求，或用于出生、成人、婚礼、丧葬等重要的人生礼仪，或用于宗教节日祭祀仪式，或用于民间工艺展会。这一切皆说明民间工艺文化已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扎根，并传承发展。于集体而言，个体记忆最终被组织、整合，汇聚成具有时代色彩的共有思想，发挥着增强集体文化认同感的社会正功能。

（一）操演中的傣族剪纸与集体记忆

剪纸在傣族宗教活动中扮演着沟通人与神的重要角色，是傣族向神灵传达心意的重要媒介。在芒市菩提寺、五云寺及傣族村寨奘房里，随处可见扎、董、壮混尚、佛幡、佛伞、佛龕等剪纸作品。可以说，在奘房营造的神圣空间里，有多少剪纸陈列，就有多少祈愿。每年举办的宗教活动为傣族剪纸技艺营造了重复操演的文化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傣族人的思想意识外化为物并被赋予神圣性。

操演记忆是一个能力记忆的过程，“记忆并非简单复制，它是一个如何建构的问题。是‘图式’（schema）的建构，即代码化，使我们能够区分从而回忆”^[17]。其中强调的就是人类手工技艺区别于机械复制主观建构的过程，在每次操演中，傣族剪纸艺人都充分发挥能动性，一方面回忆历年做摆时的剪纸内容、色彩、样式，另一方面又增添一些新的构想，因此重复操演不仅是剪纸技艺的传承，也是剪纸内容与形式的创新。宗教场域中的活态传承不仅让剪纸技艺充满生命力，而且使剪纸技艺融入到傣族人的集体记忆和日常生活中。

重复操演与重复记忆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荣格说：“精神包括个人层和集体层，前者仅能追溯到婴儿最早记忆，后者则包含了婴儿最早记忆之前，是祖宗前人生活的残余。”^[18]傣族剪纸技艺的重复操演是祖辈生活所遗留的痕迹，更是集体无意识的本能。记忆通过操演来传达与维持，同时操演又通过记忆来强化与加深。从芒市傣族剪纸文化进入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可以窥探到傣族个体—傣族传统文化—傣族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剪纸通过重复的体化实践形成操演记忆。由于个人生活在社会之中，个体操演记忆的汇聚最终构建出傣族关于剪纸文化的社会记忆。康纳顿认为体化实践“不会独立于它们的操演而‘客观地’存在。获得它们的方式不需要明确反省它们的操演……每个群体都会把他们特别需要保持的价值或其他通过身体内驱力去实现，并从中发现人身体的习惯记忆能将过去保存得多么好”^[19]。剪纸艺人在重复操演剪纸技艺时，身体记忆、习惯记忆不断形成，同时隐含于其中的“文化自觉”、民族文化认同也在不断强化，这也是傣族剪纸技艺得以传承的根源所在。

（二）仪式中的傣族剪纸与集体记忆

芒市傣族普遍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和祖先神灵，在大小节庆中包含着不同的宗教仪式。为了将人与人之外的自然、超自然联系在一起，这些仪式中往往需要一些思想意识的物化形式作为中介与桥梁。傣族剪纸广泛用于葬礼仪式中棺材及棺罩冥房的装饰，一方面剪纸纹样为亡灵具有辟邪作用，另一方面亲友通过棺木上的剪纸装饰表达对逝者的哀悼，祈求神灵保佑逝者灵魂在遥远国度得到安息。剪纸由此成为傣族人寻求人与超自然交感的媒介物，发挥着慰藉心灵与社会的功能。

如果说“仪式是一种操演语言”^[20]，那么剪纸文化通过仪式进入傣族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的过程不仅与艺人的重复回忆与操演有关，还与剪纸被运用的时空有联。只有在特定的场域中，剪纸作品被展示、剪纸的社会功能发挥作用时，人们的认知记忆才会被唤起，只有在仪式的操演中，习惯记忆才会起实质性的作用，才会被加深被融入到集体记忆中。傣族丧葬仪式中的棺木上的剪纸由男人们集体合作完成，丧葬仪式中的剪纸与逝者、天、地、神产生联系，并通过祈愿而发挥作用。丧葬仪式中，剪纸技艺的重新操演勾起人们的习惯记忆、身体记忆。于一个家族而言，仪式中的剪纸折射出家族记忆；于一个族群而言，仪式中的剪纸是族群社会记忆的缩影。在赶摆时，傣族民众经常是把事先准备好的剪纸以及其他贡品拿到奘房。奘房大厅两侧各摆一排竹桌，男人从左侧进，弯腰礼佛用右手敬献，女人从右侧进，弯腰礼佛用左手敬献。这些与宗教相关的个体行为通过世代相传成为傣族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并演化成超越个人经验的存在。剪纸在芒市各傣族村寨都有保存和传承，原因之一就是“那些关于过去的情境、意象、记忆知识等，往往需要通过一些具有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21]。仪式中重复的剪纸制作，不仅是集体的无意识行为，它还唤起和加深了傣族群体对民间剪纸工艺的记忆。

仪式让传统技艺的重复操演得以实现，唤起了傣族群体对剪纸文化的记忆，但这仅仅是从显性的外在层面分析了傣族剪纸集体记忆的形成。福柯认为：“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络……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22]那么，控制傣族人剪纸文化记忆、剪纸技艺重复操演的隐性因素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一是傣族群体信仰体系对人们言行的导向作用和约束力；二是傣族剪纸文化符号能沟通人与神界、自然界，以外化物的形式通过仪式维持傣族社会秩序。

剪纸作为傣族文化符号在仪式中具有象征性，而仪式对傣族民众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傣族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祖先崇拜及万物有灵，所以剪纸题材不论是动植物形象，还是佛祖佛塔、生活场景，都传达着人们的虔诚信仰和内心祈愿。仪式中的剪纸具有形式性，在宗教场域中，剪纸有时候是独立的作品，如扎、董、壮混尚等；有时又是作为增添其他宗教用品审美价值的装饰品，如用在佛幡、佛伞、佛龛等宗教器物。当然，傣族剪纸艺人每次制作时并非简单重复，而是在传承的过程中进行创新，并在展示、销售中赢得人们的认可。傣族剪纸作为民族民间艺术形式，在不同的赶摆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是傣族文化认同、族群认同、社会认同的载体。

宗教仪式和身体实践是傣族人社会记忆的重要构成部分，包括剪纸在内的傣族民间传统技艺的重复操演塑造了傣族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世世代代延续至今，并在文化传承中成为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因素。透过芒市傣族剪纸工艺认识傣族传统文化和傣族社会，需要从文化整体观出发，从傣族剪纸——傣族人——傣族社会相互交织的现象中探寻其传统文化可

持续发展的命脉。

五、结语:研究傣族剪纸社会记忆的当代价值

从文化整体性视角分析,“社会记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基因之一,社会记忆隐性地存在于历史发展变迁的深层,历史主体的行为方式、思维构成和价值观都受其制约,但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社会记忆这一社会发展的基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23]。目前,剪纸的存在环境有了很大变化,为了保存剪纸这一宝贵的社会记忆及其所蕴藏的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傣族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来推动剪纸社会记忆的再建构。

社会记忆具有建构性。个体之所以能回忆,是因为个体记忆是集体与社会总体思想的组成部分。个体只有将自己置身于集体中,并从中接受共有思想、接受其方式方法,才能够回想起过去。诸多民族民间工艺文化的失传甚至消失,就是一种失去记忆的过程。目前,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傣族社会亦是如此。在日益发达的交通通讯技术及不断涌入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傣族社会记忆正在遭受剧烈的冲击,传统的社会秩序与社会设置都在发生改变,甚至出现了真空地带,导致了现实与心理的混乱。

社会记忆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转型期的社会记忆建构需要重拾个体记忆与整合集体记忆。因此,傣族社会需要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以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为中心,重新建构社会记忆,从而保证社会记忆的整体性与延续性。作为在傣族传统文化中服务并表现民俗信仰核心要素之一的媒介和工具,剪纸就像编织一张大网的节点,连接着大量的社会记忆元素。这些元素依附于剪纸而存在,一荣俱荣,一损皆损。文化自觉要求人们自觉地认识文化的古往今来,正确把握文化的前进方向。对傣族社会来说,剪纸早已超越了技艺的存在,它是一种将生活黏合在一起的文化,一种维护社会秩序、赋予现有社会设置合法性的道具。因此,整个傣族社会都应重视剪纸的社会存在,积极传播传承剪纸文化,将剪纸作为社会记忆延续的一根纽带,串起代内人与人之间、代际人与人之间的记忆。不可否认,现代技术对手工剪纸造成了一定影响,却也赋予了剪纸新的生命。作为文化传承人的剪纸艺人应对此有充分的认识,积极运用现代技术为剪纸创造新的生命力。

作为社会仪式中沟通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的媒介,剪纸不仅是傣族宇宙观、价值观的外化物,亦是傣族传统文化表征的载体。傣族剪纸如同傣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细胞”。在创作与运用剪纸的过程中,傣族民众如同文化“守护者”,使剪纸不断获得鲜活的生命力。从时间维度分析,剪纸的延续并非几个传承人就能完成,它植根于傣族人的日常生活,是傣族社会记忆的建构。信仰体系是傣族剪纸工艺得以传承的精神核心,正是信仰的存在给予了剪纸巨大的生存空间与展示空间。个体在祖辈身口相传的濡化过程中习得剪纸技艺,并通过反复操演使其成为个人认知记忆、习惯记忆。各类社会仪式为剪纸的操演提供了场景,促使个人记忆升级为集体记忆,并最终变成傣族社会记忆的有机构成。

实质上,剪纸在个人记忆、社会记忆中的存储是对傣族文化基因的一种保护,是傣族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剪纸记忆连结着傣族文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个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不仅生成了傣族传统剪纸文化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传承内在机制,而且强化了族群文化认同、族群内聚力。作为傣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傣族剪纸在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现有秩序合法化的各种仪式活动中得以延续,是人们理解傣族传统社会文化的重要线索之一。也就是说,研究芒市傣族剪纸的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问题,既要从微观视角了解剪纸文化活态传承的内在机制,更要深究傣族剪纸技艺在当下得以传承的根源。

注释:

[1]刘少杰:《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

[2][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5页。

-
- [3] [法]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93页。
- [4]高萍:《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综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 [5] [英] 巴特莱特:《记忆:一个实验的与实验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李维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01页。
- [6]李光华、封履仁等:《德宏傣族民间剪纸》,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1页。
- [7]奘房,傣语意为寺庙、庙宇,是傣族村寨中南传上座部佛教建筑。
- [8]小菩少,傣语中对未婚女青年的称呼。
- [9]进洼,傣族传统节日之一,意为“入夏安居”。
- [10]咩巴,傣语对奶奶的称呼。
- [11]M. J. Hertzkovits, Man and His Work, NewYork: Applentury — Crofts, 1948.
- [12]C. G. Jung: The Psychologica Foundation of Belief in Spirits,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Vol. 8.
- [13] [美]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7页。
- [14]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先知指的是理解前已有的观念前提和假设等。
- [15]走近傣族剪纸传承人邵梅罕 2014年3月22日新华网云南频道 http://yn.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4-03/22/c_133205992_3.htm。
- [16] [法]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68—69页。
- [17] [美]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18页。
- [18]C. G. Jung: the Psychology of the Uconscious,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Vol. 7. 2nd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 [19] [美]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125页。
- [20] [美]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66页。
- [21] [美]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40页。
- [22] [法]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13页。
- [23]孙德忠:《社会记忆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1页。